

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规划项目

三星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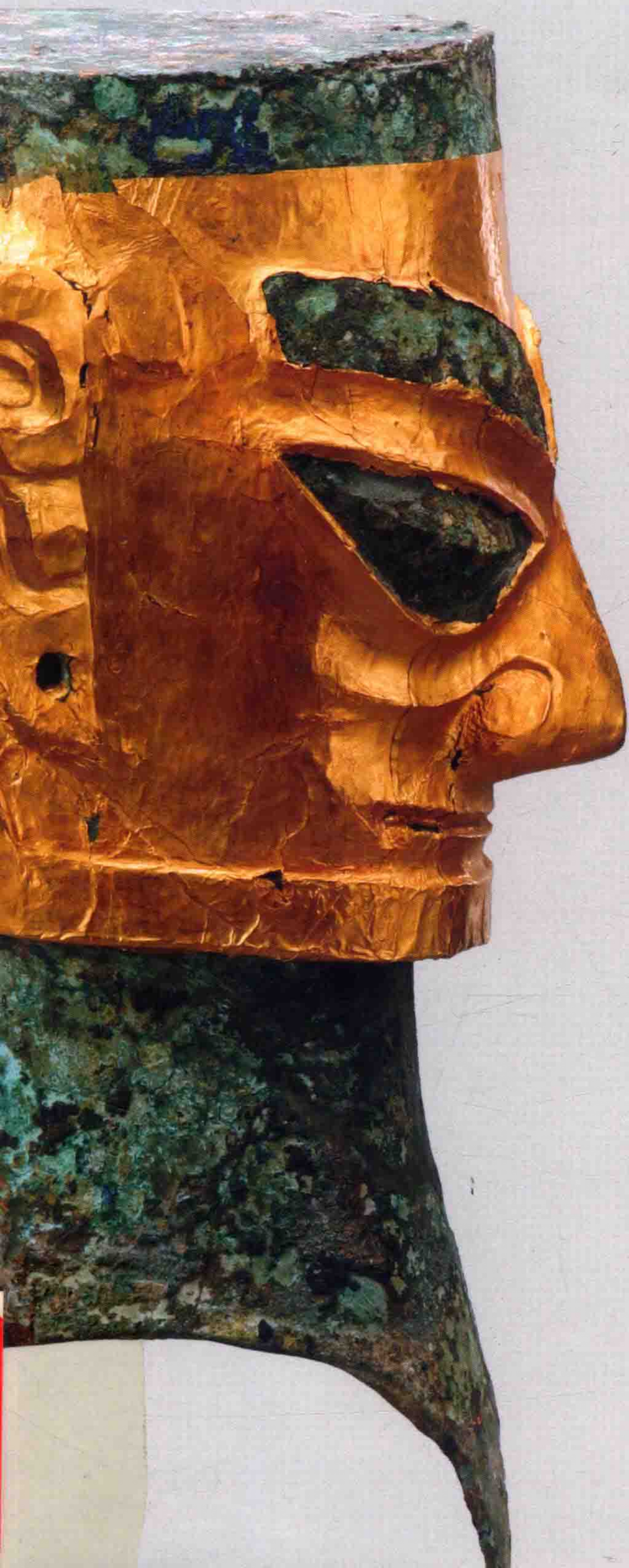
文明的侧脸

ANOTHER ASPECT
OF CIVILIZATION

SANXINGDUI

朱丹丹 著

巴蜀書社



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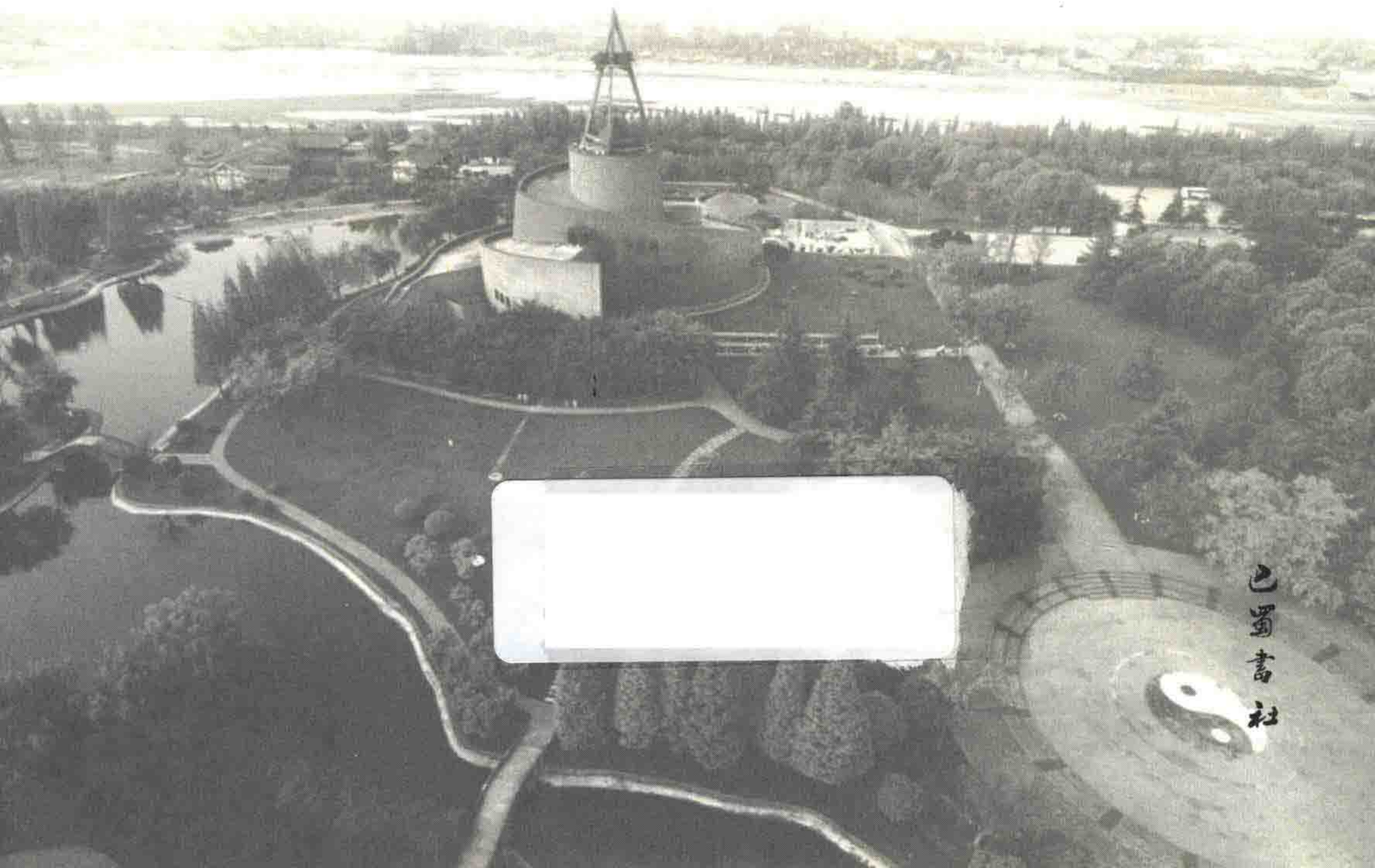
三星堆

SANXINGDUI

文明的侧脸

ANOTHER ASPECT
OF CIVILIZATION

朱丹丹 著



巴蜀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三星堆:文明的侧脸 / 朱丹丹著. -- 成都:巴蜀书社,
2016.6

ISBN 978-7-5531-0718-9

I. ①三… II. ①朱… III. ①三星堆文化—介
绍 IV. ①K87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6449 号



三星堆——文明的侧脸
SANXINGDUI——WENMING DE CELIAN

朱丹丹/著

责任编辑 童际鹏
封面设计 于会东
出版发行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发行科 (028) 86259422 86259423
电 话 总编室 (028) 86259397
编辑部 (028) 86259411
邮 编 610031
网 址 www.bs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7.625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6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1-0718-9
定 价 46.00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发行科调换
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三星堆遗址概览

时 间	约公元前2800—公元前600（新石器时代晚期—周初）
位 置	四川省广汉市鸭子河南岸（成都以北约40公里）
范 围	古城址约360万平方米，整个遗址约12平方千米
遗 迹	城墙、居址、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坑、墓葬等
遗 物	青铜树/人像/面具、玉璋/戈、金杖/虎、陶盃/豆等
文 化	目前普遍认为是古蜀国文化遗存（其他可能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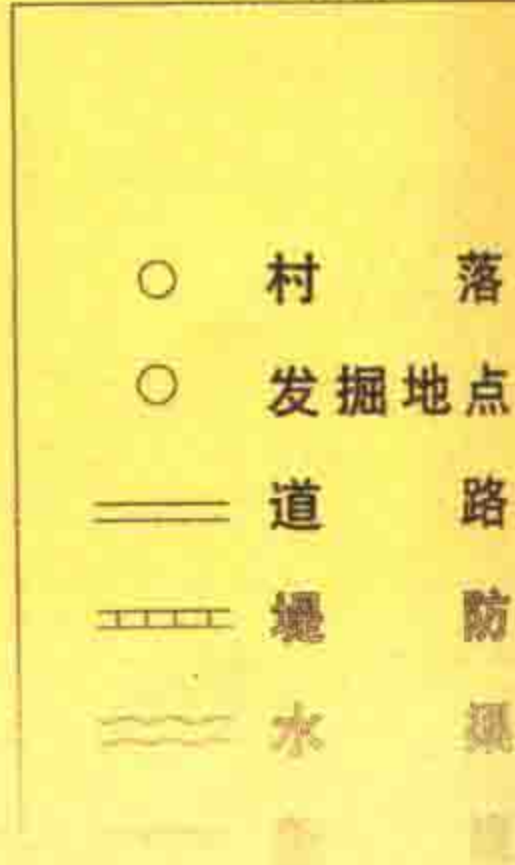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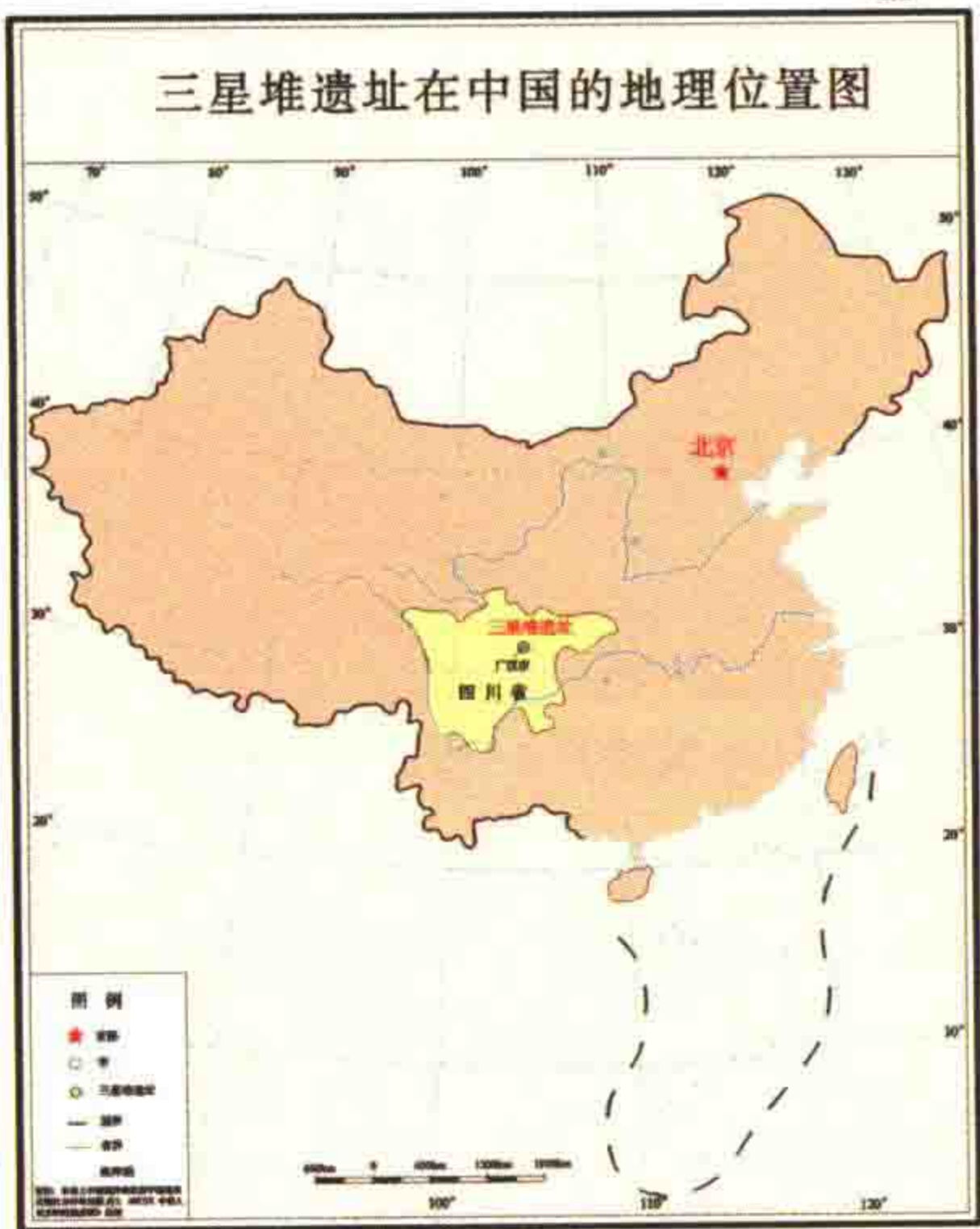
三星堆遗址年代分期

（2—4期为学术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

分 期	时 间（大约）	约同时期中国 文化代表	约同时期世界文化代表
第一期	公元前2800—公元前2100	新石器时代晚期 龙山文化	古埃及第2—6王朝； 爱琴海克里特文明； 两河流域古苏美尔文明。
第二期	公元前2100—公元前1600	龙山文化—— 二里头文化	古埃及第7—17王朝； 爱琴海克里特文明； 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王国。
第三期	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	商朝	古埃及第18—20王朝； 爱琴海迈锡尼文明； 两河流域中期亚述时期。
第四期	公元前1100—公元前600	西周至春秋初	古埃及第21—26王朝； 爱琴海“荷马时代”及希腊城邦 早期； 两河流域中期亚述及亚述帝国。

地图一

三星堆遗址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图



目 录

序/001

一座城的重现/007

1. 农民的偶然发现/007
2. 传教士第一次发掘/009
3. 大规模考古发现/011
4. 古蜀文化的新家园/016

青铜、祖先和神话/021

1. 突眼器与纵目王/025
2. 鱼、鸟与鱼鳧王/032
3. 太阳与神树崇拜/037
4. 非常的面庞/046





金玉、权威和礼仪/063

1. 黄金装饰的威严/063

2. 石之美者的敬畏/073

一座城的命运/091

1. 文明的轮廓/091

2. 三星堆的继承者/096

3. 古蜀之外/101

尾 声/113



序

三星堆和古蜀传说

“三星堆”，原本是指坐落在中国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三星村内三个起伏相连的土堆。它们与北面犹如一弯月牙的“月亮湾”台地隔着马牧河南北相望，在川西平原广袤的农田中非常醒目，因此被当地人颇具情致地称为“三星伴月堆”。早在清代嘉庆《汉州志·山川志》中就有“治西十五里，有三星伴月堆”的记载，“三星伴月”还被誉为当地的一处自然景观，可见这三个土堆在早前就已经颇引人注目，只是当时还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真正“身份”。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经过考古发掘才了解



三星堆残堆旧貌



三星堆遗址附近地形



三星堆残堆覆土保护现状

到，这三个土堆其实并非自然生成，而是夏商时期古人夯筑的城墙残段。墙体由于数千年的风雨侵蚀和人类活动才渐渐剥落成了一条高低错落的土埂。

在离三个土堆不远的地方，从1929年农民第一次偶然挖到四百多件玉石器开始，陆续出土了大批相关的古代遗物和遗存，并且显现出不同于其他任何已知的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于是学界决定将其命名为“三星堆文化”。顺带说一下，考古学上一般将首次发现典型遗迹的小地名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比如“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就是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的村名，同样，“三星堆文化”也是从“三星堆”这个特殊的小地名而来。

考古学上的“三星堆文化”，是指年代为公元前2100-公元前600（距今约





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
其地東接于巴，南接于越，北與
秦分，西奄峨眉。

——華陽國志

夫蜀都者，蓋兆基于上世，開國
于中古。廓靈關以爲門，包玉壘
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
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
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庵藹
焉。

——蜀都賦

4100年到2600年前，相当于黄河流域的夏、商、周初），集中分布于成都平原及东部的峡江地区的，以鸟头勺把、小平底罐、高柄豆、三足盃（hé）为典型器物组合的一支考古学文化。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行，人们发现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一座面积约360万平方米的古城，大型建筑遗迹、祭祀活动遗迹、

手工作坊以及大量独特的青铜器、玉石器、象牙、陶器和金器等，其发展程度远远超出人们对于古代四川的认知。

一直以来，上古的四川地区都被看做是几无文化可言的戎狄之域，有信史的年代已经到了战国时代，即秦灭巴蜀的公元前316年（距今2300年前），史书记载巴蜀人民摆脱野蛮、爱好文雅也是从汉景帝派文翁入蜀教化才开始的。不过，根据零星的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在秦帝国将四川盆地纳入其版图之前，盆地西部平原上曾有一个历经夏、商、周三代的古老国家——“蜀”国，它创造过非常繁盛的农业文明，甚至殷墟甲骨文中也好几次提到了与“蜀”的往来。（“蜀”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上有大眼睛，下有蜷曲身体的类似虫子形状的形象文字，可能是商人对当地族群的一种贱称）

文献中关于蜀国历史的记载相当简略，传说蜀人的始祖“蚕丛”及其民众居住在成都平原以西、川西高原上的岷山地区，被称为“蜀山氏”，之后另一位首领“柏灌”带领一部分人向东进入成都平原，在此发展农业和渔业，又经过“鱼凫”、“蒲卑（杜宇）”、“开明”等三个时代，最后于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三星堆文化因为没有文字发现而无法自名，但是它所处的位置和年代，文化的特征与内涵，都与传说中的“蜀”国极其吻合。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三星堆正是“蜀”国的遗存，并且应是它的一个中心都邑。

三星堆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文化是高度繁荣、自成一体的，同时，它繁荣的年代——距今3000-4000年左右，也正是我国整体迈入文明时代的重要阶段，伴随着各地青铜的繁荣、文字的出现、城垣的修建、礼仪的完善，多个地域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碰撞，一步步走向融合，最终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除了中原的夏、商王朝之外，在富饶神秘的大西南还存在



着一个相当繁荣、极富特色的古蜀王国，并且与长江中下游的吴城文化、良渚文化、中原的夏商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一同描绘了东亚大陆上波澜壮阔的上古画卷。

小知识

考古学文化 考古学文化是一个内涵较为丰富的学术概念，一般是指分布于一定地理区域、处于一定时间范围、具有统一遗存和技术特征的综合体。并不是每一处考古遗址和每一次考古发现都会被认定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只有那些分布范围较广、延续时间较长、遗迹和遗物具有一定特征的考古发现才有可能。比如著名的仰韶文化，是一支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持续时间为距今7000年-5000年，以彩陶为共同的显著特征，包括河南浥池仰韶村、陕县庙底沟、陕西西安半坡村、临潼姜寨遗址等众多遗迹点。



一座城的重现

1. 农民的偶然发现

1929年春季的一天，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一名叫燕道诚的农民正与儿孙在门前不远处清理水沟，突然，随着一声锄头撞击硬物的声音，他们发现了一个直径半米多长的大石环，接着挖下去，又发现了一大批躺在泥土中的玉石器。燕道诚在前清官府做过笔杆，是一位比较开明的文化人，被当地人唤作“燕师爷”。燕师爷虽不具有文物知识，但还是知道挖到了宝贝，于是立刻掩盖起来不敢声张，晚上才偷偷将这些玉石



燕道诚全家福



1929年出土的大石壁及玉壁



葛维汉（前排右一）和参与发掘的地方士绅，以及右后方的武装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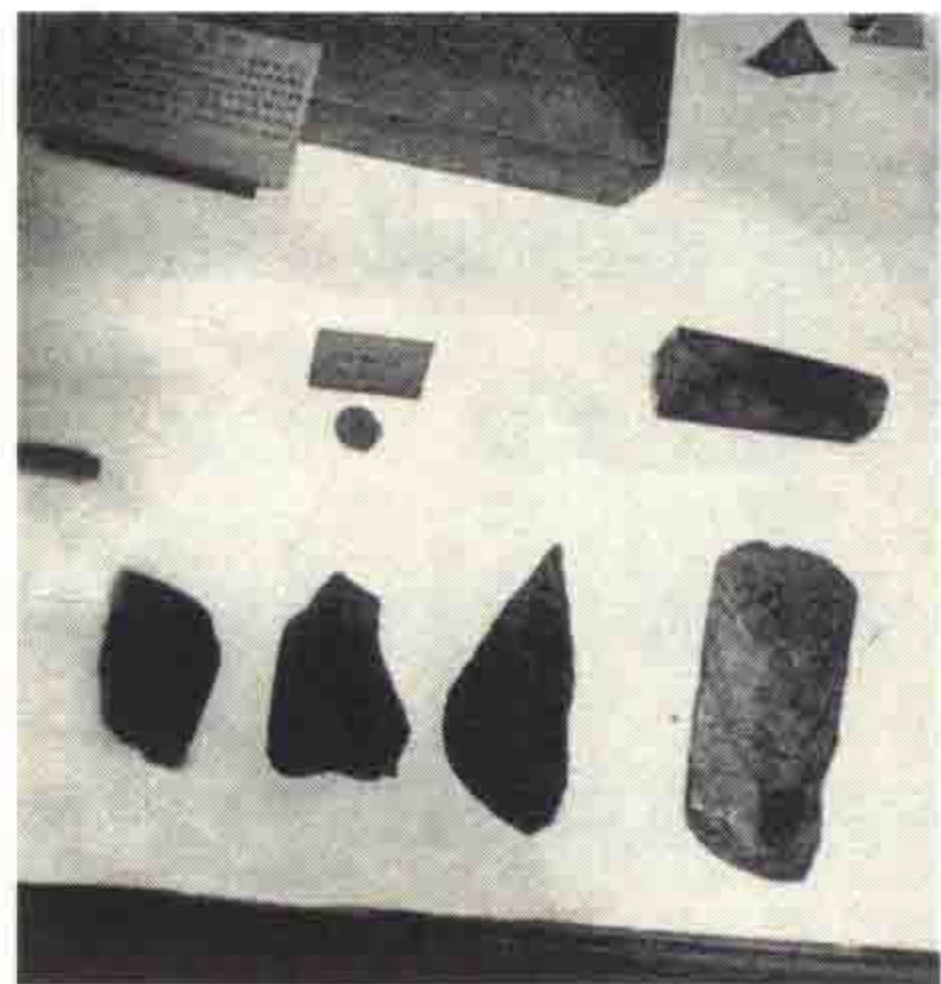


1934年发掘的现场合影

器取出藏在自家房屋周围。不过据燕家后代说，这笔意外之财没有给燕家带来什么好运，反倒是令父子二人生了一场大病，大概是基于破财免灾的想法，在发现宝贝的一年之后，燕家人将这批文物拿出来贩卖或者送人。



2. 传教士第一次发掘



1934年部分出土物

转眼时间来到1931年，燕家发现宝贝的消息已经扩散开来。当时正在附近传教的英国基督教士、剑桥大学博士董宜笃得知后非常关注此事，但认为自己的外国人身份不宜直接出面，便找到当地的驻军团长、自己的信徒陶宗伯，专程去燕家借了五件文物带到华西协和大

学（1910年由基督教会创办的医科大学，以下简称华大），请美籍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戴谦和当即断定它们为商周遗物。同年6月，戴谦和与董宜笃在陶团长的协助之下来到月亮湾一带调查，当燕道诚听说自己挖出的宝贝对研究很重要时，便将家中“收藏”的一部分器物交给戴谦和带回华大博物馆保管。

1934年春天，在广汉县县长罗雨苍的邀请之下，华大博物馆馆长、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教授、美籍传教士葛维汉带着发掘执照和审批手续率考古队前来广汉进行三星堆历史上的第一次科学发掘。

因为当时“广汉玉器”在成都古董市场上已经赫赫有名，民间私掘贩卖的情况不少，此次为了防止盗贼“抢劫肥猪”（袭击、抢劫富人），罗县长还专门派80名士兵日夜守卫。发掘从3月6日开始，据参与发掘的林名钧记载，附近乡民不断有人造谣说考古队挖出了“金马”，加之“邻近匪风甚炽”，考古人员每晚都要步行八九里去躲避匪患，所以艰苦的发掘工作只进行了10天就不得

汉州（广汉）发掘简报

葛维汉著 沈允宁译 陈宗祥校

1931年春，董笃宜（V. H. Donnithorne）牧师获悉四川汉州（广汉县）一位富裕农民燕先生在溪底发现数件石器、玉环、方玉和玉刀。董笃宜确认这批器物很有科学价值，颇为重视；认为应及时保存下来，避免散失。

董笃宜的记录

1931年春，我听到当地群众议论：离该地不远，发掘出石刀和石璧。后来又获知：农民挖水洞时，又出现许多器物，可是都分送给乡邻和戚友。

作为一个外国人出面获得这批散失在私人手中的器物，是不妥当的，理应通过当地县官办理。为此我催促陶旅长出面，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当时陶旅长表示同意，如可能的话他会带来几件石器。没过几天，他拿来五件石器（现藏华西大学博物馆）。陶旅长说：这批器物是一位富农造田所发现。据他本人讲，他不愿意卖给我或其他人。他现在借给陶旅长，此后是要退还的。陶旅长要我短期保留。次日我乘车返蓉，交给戴谦和（D. S. Dye）保管。几天后，我遇见陶氏就向他请求，尽量能为博物馆收集这类器物。不久他与燕氏带来了在他田里发现的几块石器，后者对此即产生了疑惑，不知我要这批石器有何用途。陶氏也对这次发现引起了极大兴趣，并想把采集到的石器保存在博物馆里。最后，燕先生把自己的五件石器送给陶旅长，他作为礼物又送给博物馆保存。

此后，六月间，我们在广汉县的太平场遗址进行了考察、摄影。遗址距离广汉有十八（华）里。这次发掘队由陶旅长和他的六名警卫员，戴谦和、摄影员晋先生和我所组成。

郭沫若复林名钧的信

林名钧先生：

很高兴接到你和葛维汉先生的信，谢谢你们的好意，送给我如此多的照片、图片以及戴先生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的文章，并且告诉我有关发掘的详细情况。你们真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我希望将来你们能取得更大的成绩，研究古代的遗迹和建筑、雕刻、坟墓和洞穴。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今后会有一系列的发掘以探索四川的史前史，包括民族、风俗以及他们与中国其它地区相接触的历史。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很遗憾，我不能归国协助你们的发掘。

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此外，汉州的陶器也是属于早期的类型。你们认为汉州遗址的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将来四川其它的地方尚有发掘，它们将显示出此文化分布的区域，并提供更多的可靠的证据。

根据你们的要求，我将我写的两本有关中国考古学的书送给你们，并且请书店直接将最近出版的一本送博物馆，另一本送葛维汉先生。以后如有新作，我也将再送给你们。

现在我很忙，就此搁笔。

祝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沫 若

1934年7月9日

注：1. 林名钧先生在华西大学博物馆工作期间，协助负责过该遗迹发掘工作的一部分任务。2. 1934年7月，中国著名作家、学者郭沫若先生在日本。此信由四川大学童恩正教授译自Davi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6, 1933-1934, P. 129-130.